

平庸时代的道德教育

王建华

摘要：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决定了这个时代里道德教育的可能遭遇，但道德教育绝不能完全屈从于时代精神。由于沉思和德性密切相关，在一个平庸的时代里，道德的平庸不可避免。道德教育要避免平庸，必须从人的超越性出发，重审好人教育的古典哲学，以平衡道德与教育之间的张力，将道德教育由消极的行为训练提升为一种积极的行动；通过德性践行以恢复道德及其教育的确定性，并将道德教育定位于为平凡的人提供崇高生活的可能性，以避免平庸的恶。

关键词：平庸时代 道德平庸 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王建华（1977—），男，河南省息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道德如何教育”是人类面临的永恒的难题。在古典时代，教育就是道德教育，道德是教育的核心议题。现代以降，随着教育的过度制度化，学校成了教育的代名词，知识也取代道德成为了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在学校里，教育不再必然意味着道德教育，在智育的挤压下，道德也不再是教育的灵魂，道德教育在整个现代教育系统中仅占很小的部分。近几十年来，在后现代知识观和后现代道德观的冲击下，现代社会和现代教育中的去道德化倾向日益明显；由于道德的教育危机与教育的道德危机相互叠加，道德教育的可能性愈来愈不确定，美德成为一种偶然，道德成为一种装饰。我们时代的道德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当前这样一个平庸的时代里，由于沉思被浮躁遮蔽，美德伦理被底线伦理取代，思想和道德的平庸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状态。在一个唯物主义的社会里，作为对于崇高的一种解构，平庸反倒赋予了现代人一种虚假的道德优越感。但事实上，无论任何时代，所谓道德即意味着“善”或“好”，平庸本身就是对于道德的一种反讽而不是“不好也不坏”的折衷。现实世界里不存在平庸的道德，也不应放任道德平庸，就像不存在坏的好人或好的坏人一样。道德的灰色地带只是人们为不道德行为所找的借口。当前世俗生活中，由于底线伦理的不断被突破，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失去了共识。好人与坏人的区分被所谓做好事的人与做坏事的人所取代。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被“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是善的”所取代。由于在道德和精神生活中普适价值观的逐渐被瓦解，随着由现代性危机所导致的道德危机在整个社会领域的不断蔓延，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的合法性面临深刻危机。我们有必要追问：在平庸的时代，平庸的人是否仍能践行道德德性？平庸的道德如何教育？道德平庸的教育又何以可能？

一、道德何以平庸

康德曾将人类历史区分为三个时代，即英雄时代、信仰时代和平庸时代。我们时代正处于人类的平庸时代，即无信仰的时代。这个时代不再可能出现英雄时代那样伟大的人物，也不再可能诞生信仰时代里那些伟大的思想[1]。今天无论多么先进的科技，多么崇高的地位，多么庞大的财富，很快就会被超越或被忘记。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人类第一次实现了或接近实现了“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表达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立言”这一层面，每个人都是不朽的又都是速朽的。由于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信息爆炸和经济繁荣，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物质的文明被严重高估，精神的价值和信仰则被严重低估。一切与技术相关的事物都趋向于进步主义，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事物都趋向于平庸。现代社会，人们在意的是技术的进步而讨厌思想的高深。然而，按帕斯卡尔的说法，人只不过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如他所言：“人显然是为思想而生的；这就是他全部的尊严和全部的优异；并且他全部的义务就是要像他所应该地那样去思想”[2]（P74）。“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2]（P157）。在一个没有思想或不重视思想的平庸时代里，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人注定也会像芦苇一样的平庸。

平庸不同于平凡。平凡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平凡的人可以仍不失真善美。平庸则意味着人对于卓越的主动放弃，对于沉思和德性的疏远。“一个人的精神越伟大，就越能发现人类具有的创造性；平庸的人是发现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2]（P7—8）。在思想平庸的时代里，由于人主动地放弃了对于美好生活的沉思与德性践行，盲目追求物质的丰裕和肉体的快乐，道德的平庸不可避免；而平庸的道德暗藏巨大的风险，即平庸的邪恶。作为道德平庸的一种后果，现代社会在表面上虽然高度的多元，但实质上却是一个标准化的单调社会。表面上现代社会中的人可以持有不同的道德观点，甚至是政治观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高度自由和自愿的，但实质上现代社会中的人大都过着高度相似的或同质化的生活，分享着一致的道德规则或社会契约。表面上现代社会由于人的规则意识的增强而更加的道德或文明，而实质上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对于规则本身缺乏深度的反思和超越，自由意志被意识形态所规训，正逐渐远离好的生活而陷入一种坏的生活或成为“文明化的野蛮人”。“现代社会试图通过完善各种制度的技术性程序来制造好的社会、好的制度或者好的法律，这是幻想，这就像想仅仅通过学习标准的句法而写出好文章”[3]（P63）。总之，作为一种抽象存在，现代社会的维系要高度依赖于“游戏规则”而不是“社群感觉”（common sense）。由于“社群感觉”逐渐消逝，每个人所能拥有的或被植入的只是碎片式的符合规则功利主义的道德规范，而不是良知。没有什么比人们的行为是“遵从道德规范”还是“符合道德规范”更具决定性作用。“一个有道德的人是完成了将基本道德规范内化并且培养了良知的人，并不仅仅是以他的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为特征的”[4]（P109）。当前，由于人的德性本身正降格为作为规则的道德，而规则本身又不断地被功利化、相对化，这也成为现代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源所在。

由于平庸的不可避免，与传统社会相比，在道德问题上，现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例外。现代社会一下子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不同时期相互冲突的传统和习惯，并根据现代性的标准对于道德和教育本身进行了系统的改造。由于共同感的缺失和现代性本身的唯“新”主义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稳定性架构，有机团结的熟人社会逐渐被机械团结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在一个由陌生人所组成的“新”社会里，由于道德常识和社会情境经常相互脱节，现代社会正在逐渐成为一个抽象的社会而不是文化的共同体。由于网络结构的兴起和社会本身社团性质的消失，“社会何以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鲍曼就认为，“社会”是社会学词汇中受到质疑的第一个术语。“犹如上帝在几个世纪之前的隐退，社会的隐退在一个认知上无知和伦理上怀疑的年代也呼之欲出了。隐藏的上帝引发了16~17世纪的皮浪危机，而隐藏的社会则引发了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早期的皮浪危机”[5]。现代社会里，由于社会何以可能面临合法性危机，人性和道德本身逐渐脱离了时空情境的限制和制度环境的保护，要么以文本的形式被分享、被谈论，要么则成为个人的隐私从不示众。由于现代社会中人的高速流动性和人际关系的暂时性，道德情境可重复的概率被显著降低，再加之熟人社会中道德结构本身的锚定效应消失，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短期化、表面化、功利化，人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按赵汀阳的说法，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功了而人失败了”[3]（P8）。表面上看现代社会中作为规则的道德规范保障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然而实质上人类理性关于道德的种种谋划却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本真的道德生活。在规范伦理学的指导下，在学校道德教育过程中人的良知成为了被贩卖的道德知识而非内心的道德律令。在制度化学校教育的规训下，

道德德性不再是人实现自我内在超越的永恒目标,而是成了道德的课堂上被考核和检测的对象。学校教育过程中,学生一旦通过了相关考核和检测,道德教育的目标便会被人为的消磨掉。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人性的价值让位于伦理的教条或社会的规范,其结果,道德的平庸也就不可避免。

二、教育与道德的张力

对于人而言,除了进化的力量使得道德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或近乎本能之外,道德教育的存在也至关重要。那些人类最根本的道德观念必须有其独特的承载物(宗教或风俗)来作为支撑,并通过道德教育活动中人为的教化行动才能保证道德的连续性,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持续存在和变迁。虽然每一代人都分享有独特的时代精神和道德观念,虽然每一代人身上都会有风俗和习惯的改变,但变化中亦有不变的东西。由于道德教育的存在,无论任何社会也无论任何时代“道德基本上是一种持续的事物,只要我们考察的时间段不是很长,道德始终会是同样的道德。道德行为在明天和今天都应该是一样的,不管行动者的个人禀性是什么”[6](P29)。究其根本,除了道德的先天基础在于人的本性的同一性之外,道德教育在消除道德隔膜和冷漠、保障道德的连续性方面也居功至伟。如果没有关于道德的教育活动,而仅仅将道德交给人的本能或天性。那么,由于人的本能的局限和某些致命的小概率事件,人类社会的道德存在将充满偶然,完全被命运或运气所左右。毕竟人性之中善恶并存,教育的使命或宗旨就是张扬善和抑制恶。客观上,道德从来都是“假言命令”而非“绝对命令”[4](P131)。社会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作为手段与目的的冲突不可避免,既无法符合“每一个人都是目的”的道德理想,也无法实现康德所谓的“目的王国”(kingdom of ends)的理性设想。但也正是在这种利益的冲突中,道德理想国的不可能性使得人际之间产生了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必要,人与人之间基于共通感或常识才实现了人的可社会性,才孕育或倒逼出了道德及其教育。

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健全的理智,而健全的理智需要健全的感觉。“现在对于教育来说重要的东西仍是某种别的东西,即造就共同感,这种共同感不是靠真实的东西,而是由或然的东西里培育起来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就在于:共通感在这里显然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造就这种共同感觉,对于生活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7](P312)。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基于人类所特有的“共通感”或“人的基本经验”在人际之间建立起关于道德的“日常感觉”或“社群感觉”,即道德的常识。按照尼采的说法,“道德乃是个人群体的直觉”[8](P201)。道德教育所基于的道德直觉,其功能就在于提供一种行为的确定性和反应的敏捷性,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社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就意味着人既不能完全为了个人的欲望而放纵自己,也不会完全被道德的教条所约束而彻底的压抑自己的本能。“每个人既有道德上的义务,也有道德上的权利”[4](P77)。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那些拥有健全理智的人在采取行动时总会在自己“最喜欢做但达不到”和“最不喜欢做但不得不做”的事情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以免自己在群体中因为道德的出格而成为“异类”或“异数”,从而失去社群的认同或道德上的排斥。

借鉴哈耶克的说法,人类社会道德规范的建立属于“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一种。作为一种“合作的扩展秩序”,无论何时,道德秩序只能通过演化而建立,它有赖于集体的个人主义(民主机制)而不是个人的集体主义(独裁机制)。道德秩序的这种高度复杂使得任何工具理性的设计或人为灌输都成为不可能或不可能长久。对待道德及其教育,我们不能仅以政治正确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世俗生活,否则“坏的言论会当成好的言论,而偏见就会轻而易举伪装成理性”[9]。由于集体选择的不可能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自由地选择

自己的生活方式,并通过教育过程让他们有能力对于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并做出有价值的选择。如果缺乏充分的自由选择 and 必要的对于人性的培养教育,任何基于理性的自负而进行的道德规划以及基于意识形态所进行的道德灌输都会带来人为的灾难,即道德平庸。人类社会实践表明,由于受人的“双重历史性”制约,道德的本质既是理想主义的也是保守主义的[7] (P303)。一方面,道德作为人性和社会性的综合表达,具有某种即时性。道德教育着眼的只能是当下社会的道德合法性和正当性,不支持延迟满足。另一方面,道德之所以为道德又是理想主义的东西,它激励人们追求某种终极意义上的好生活,即幸福或至善。换言之,道德既指向于底线的道德又可以指向于人的美德。不过,“习惯和知识与美德是矛盾的。是美德带来了秩序。道德是习俗和习惯,而美德不是”[10]。道德的这两个不同方面(普通的道德和美德),实质上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道德。按尼采的说法,即“可视的道德”和“不可视的道德”[8] (P83)。所谓可视的道德基于社会的需要,表现为遵守习俗和习惯,即道德的表层结构;所谓不可视的道德则基于人的内心,通过人性的自由涌现来创造社会秩序,即道德的深层结构。日常生活中可视的道德和不可视的道德同时运行,二者缺一不可。道德教育过程中,单独的重视某一方面都会导致道德结构的失衡进而造成社会的道德危机。

人类社会由于美德具有某种不可教性,教育之于道德大多局限于知识层面或仅仅教授那些可视的道德规范。加之人的道德在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间的固有冲突,道德危机的产生有两种可能,一是社会规范或伦理纲常过于压抑人性,从而使人的天性发生扭曲,道德成为一种面具或伪装,人性被教育严重异化。另一种则是社会缺乏必要的道德规范和纪律约束,个人行为不受任何教育的规训,自由意志没有了界限,也会导致社会的瓦解。“道德为我们勾画的理想,是归属与权力、屈从与自主的令人吃惊的混合物。当我们试图反叛它时,我们对规范之必要性的记忆就被无情唤醒。而当我们遵守它时,它又允许理性去支配那个约束我们的同样的规范,并借此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6] (P122)。由于这种冲突和约束存在,人类的道德教育永远是“失败”的或不足的。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或哪个时代的人 would 认为自身或自己所处的时代在道德上是足够好的。未来社会中物质的极大丰富完全可以期待,但道德及其教育的危机可能仍将不可避免。

虽然教育与道德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但自人类结成社会以来,道德本身就不可能作为一种纯粹的自发机制存在并起作用。从古至今无论以何种形式,道德的教育都必不可少。如果没有道德教育机构,社会必然会瓦解。传统社会中,家庭和教会是人类进行道德教育的最主要场所。现代以降,随着宗教的祛魅和教育的世俗化,公立学校教育开始成为道德教育的新的制度框架。在欧洲,公立学校制度建立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传播知识,对于世俗化的公立学校是否适合于提供道德的教育一直存有巨大争议。“学校的世俗化归结为价值与思想的缺失,只有工具性的智力教育。虽然人们认为这一状况不健康,但很难,甚至不可能将学校转变为道德教育的场所”[11] (P56)。但最终在社会分工和教育制度化的巨大压力下,无论是否愿意,道德还是作为知识问题的一部分被引入学校系统中。从此以后,道德教学就成为了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受到知识人教育信条的消极影响,现代学校里道德教学成功了而道德教育却可能失败了。尽管如此,在新的道德教育机构被发明或被创造出来之前,现代社会中的学校仍然是进行道德教育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有效的场所。考虑到现代社会中“悖论现象”的普遍存在,道德与教育间的张力永远不会消失。一方面,制度化的学校很难有效开展道德教育;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又无法脱离学校教育而独立存在。换言之,现代社会道德绝非只是现代教育的代价,同时也是现代教育的生长点和学校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未来的信息化时代或网络社会中,对于学校而言,知识的传授将具有极大的可替代性,唯有道德及其教育才是学校之所以为学校,教育之所以为教育的最稳定的合法性来源。20 世纪初,涂尔干就认为,宗教祛魅以后,学校就是道德教育的适当环境。“这正是教育的任务和光荣。”“学校具有一种至关重要、专业分明的功能:创造一种按照社会需求来塑造的一个全新的存在。”

“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存在”[6] (P468)。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专业化和社会分工的加剧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社会网络以获取知识,但至少在目前还没有出现足以取代学校的更好的道德教育机构,目前也没有比学校更好的或更适合进行道德教育的场所。在世俗化的学校里,人的可塑性是一切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天赋论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所有教育家应当看到托付给他的个体都具有可教育性。在这些个体身上尽可能地寻求和找到进步的途径”[11] (P67)。根据现代社会理性的原则以及关于人的可塑性的假设,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实现人的“灵魂的转向”,才能产生“全新的存在”或“新人”。

三、道德教育:从行为到行动

由于实践中不同道德价值间的冲突或张力的存在,道德的发展经常会导致人生的困境,即人性的悖论或两难的选择。“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绝对法则,需要我们完全服从;另一方面,道德作为一种完美的理想,我们自发地追求着它”[6] (P96)。就人的道德德性本身而言,可以是自向性的(self-regarding),可是他向性的(other-regarding),也可以既是自向性的又是他向性的[12] (P103)。不仅利他主义是道德的,集体主义是道德的,为了社会是道德的,为了自身的修养或自利(self-interested)也可以是道德的或符合德性的。亚里士多德曾区分两种自利:“追求物欲、满足灵魂非理性部分的卑下利己主义;追求满足理性欲望的高尚利己主义”[12] (P184)。《理想国》中的哲学王为了能“获得对善的形式的观照”而不喜欢“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高尚利己主义。“思想史学家的共识是,自利与自私根本不同。前者是所谓‘启蒙了的自我’(enlightened egoism),后者则可称为‘蒙昧的自我’(egoism)”

[7] (P69)。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自私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而自利则是一个客观性事实。对于自私需要人性的超越,对于自利则必须尊重。“无论如何都会有若干道德规范是建立在我们所有人所共有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无论这些道德规范是否在某个社会里发挥效用,或在什么样的社会里发挥效用”[4] (P69)。虽然有相同的利益指向可以作为道德规范的基础,但道德教化或实施仍歧路驳杂。由于存在人性的悖论,从短期看,着眼于社会的和政治的需要而进行的行为训练和纪律规训对于道德行为的规范可能很有效,但长远来看,还是需要符合人的本性的道德观念来改变人的道德行为,并上升为积极的行动。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在人的本性和社会性之间保持平衡,在道德观念与道德实在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通过人的积极行动将人类特有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利奥·斯特劳斯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起》这部作品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是“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we are in between beings)。人类行为更接近神的部分,阿伦特称为“行动”(Human Action),而更接近兽的那部分,阿伦特称为“行为”(Human Behavior) [13]。长期以来,在社会学视野中,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促成人的社会化。按社会学的理解,道德教育也主要与行为训练或纪律相关。但在哲学的意义上,道德本身主要意味着行动而不仅是行为。“一个活动,如果它表现为以可能的方式去达到某种结果,那么它是一个行动;如果表现为以被允许的方式去行动,则是一个行为。可以说,一个行为就是附加了规范意义的行动”[3] (P103)。由于涉及到价值选择,对人而言,只有消极的行为而没有积极的行动无所谓道德。“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自由或者机会去决定赞同或反对某一则道德规范的破坏行为,并将相应的决定付诸行动,那么显然不可能造成故意地或疏忽大意地破坏道德规范的行为”[4] (P115)。以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为前提,道德教育就是要人学会合乎道德地行动,而不只是被动地遵守行为规则。如果仅仅是遵守规则就算是有道德的话,那么监狱是人类最道德的地方。“如果对不利后果的考虑决定了行为,那么即使这种行为从根本上符合道德规范,它也不是道德行为”[6] (P32)。人的道德行动要以自由和自愿为前提,被强迫或在不

自由状态下的行为选择根本不适合用道德来评价。当然，在具体道德实践中人的“行动”与“行为”是分不开的。对于道德行动与行为的划分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论的澄清。道德行动要以必要的行为为基础。没有行为就没有行动或者说行动本身也必然是一种行为。不过，道德之所以为道德不能止于行为而必须要上升为行动。道德行动背后有知、情、意三因素。“知”代表了人的理性，是道德的基础。“理性使道德意识的出现与运行以及自由承担责任成为可能”[11]（P11）。没有理性无所谓德性，没有德性也无所谓道德。“情”和“意”不属于人的理性范畴，但对于人的道德行为和行动的发起和维持至关重要。在道德问题上，人的情感有时会独立于理性。道德行动并不总是按照道德知识的知性逻辑来展开，更不完全是符合理性的预期。道德行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很大程度上不是由知性或知识的逻辑决定，而是取决于人的情感的激励和意志的坚持。“意志是从思想过渡到行动的中介。完全缺乏意志力的人，只能‘思想’，不能‘行动’”[14]。哈姆雷特“干还是不干（to be or not to be）”的困惑，其实质就是思想多于行动。

最后，就道德作为行动而言，道德教育的目的既不是教人驱利避害也不是让人不做坏事，而是要引导人去做好事、做好人，使人的灵魂持续地处在一种善的状态，并一直追求着至善，即倾向于过一种积极的生活而非消极的生活。“在道德教育中，以更高的理性为指引的进步，如果不能揭示新的道德取向，不能引发对公正的更强烈的渴望，不能以潜在的志向唤起公共良知，就不可能实现”[6]（P15）。人类社会对于道德德性的追求永远不要满足也不可能满足。道德生活与行动充满各种可能性但绝没有中间地带。在道德问题上“不好不坏”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如果一物不是‘恶’（bad），那就一定是‘善’（good）。中性的情况可以忽略，因为一物在任一情境内都可以有恶的性质或善的性质，只有特别偶然的情境才是不善不恶的”[7]（P70）。一个不做坏事的人很可能仍然是一个平庸的人而不可能是一个好人；一个没有人做坏事的社会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社会而不可能是一个好社会。好社会的本质是一个好人的社会而非有秩序的社会或碰巧为我们喜欢的社会。“即使一个社会中各个成员能够做到和平交往，没有任何冲突，但这样的社会也不过是一种非常平庸的社会。除此之外，社会的面前必须有一个它要实现的理想。社会必须拥有必须实现的善，必须为人类的道德遗产作出原创性的贡献”[6]（P16）。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精神生活的不断进步，道德教育的领域必将不断地拓展，以满足人的幸福和健全社会在政治、经济以及价值等领域的多要求。在终极意义上，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积极的行动超越思想的平庸以造就沉思的好人，并通过好人成就一个好的社会。

参考文献

- [1] 汪丁丁. 串接的叙事:自由·秩序·知识[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5.
- [2] [法]帕斯卡尔. 思想录[M]. 何兆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 [3] 赵汀阳. 论可能生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4] [德]诺博托·霍尔斯特. 何为道德——一本哲学导论[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 [英]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M]. 南京:郇建立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30.
- [6] [法]爱弥尔·涂尔干. 道德教育[M]. 陈光金, 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汪丁丁.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 [8] [德]尼采. 快乐的科学[M]. 黄明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9] [美]玛莎·纳斯鲍姆. 培养人性:从古典学角度为通识教育改革辩护[M]. 李艳译. 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5.

[10] [印]克里希那穆提. 教育就是解放心灵[M]. 张春城, 唐超权译.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192.

[11] [法]路易·勒格朗. 今日道德教育[M]. 王晓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9.

[12] 余纪元. 《理想国》讲演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3] 汪丁丁.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J]. 财经问题研究, 2011(7):11.

[14] 汪丁丁. 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141.

Moral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ediocrity

WANG Jian-hu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an age determines what the moral education could be. However, moral education never yields to the spirit of an age. Moral mediocrity is inevitable in an age characterized by thought mediocrity. In order to avoid moral mediocrity in moral education, it is really necessary to proceed from the transcendence of humanity (People can be ordinary but not mediocre) and re-examine the classical philosophy of good person education to keep a good balance between morality and education, therefore,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 from a negative behavior training to a kind of positive action.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restore the certainty of morality and education through practice, which,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mor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of noble life for ordinary people and avoiding the evil of mediocrity.

Key words: age of mediocrity; moral mediocrity; moral education

选自《大学教育科学》2014年第4期